

章翰

魯迅與馬華新文藝

風華出版社

魯迅與馬華新文藝



章翰

風華出版社

1977年10月

目 录

鲁迅对马华艺术的影响	1
鲁迅逝世在马华艺术界的反应	17
鲁迅致新加坡朋友的信	37
马华文化界两次盛大的鲁迅纪念活动	44
张天白论鲁迅	50
附录：	
集体主义旗下的鲁迅先生	57
伟大的认识	
——为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作	62



〈號專迅魯魯魯魯〉

悼魯迅

魯迅先生逝世了，在民族危亡的關頭，我們失去了這位偉大的戰士。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一生。他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堅強的意志。在黑暗的年代，他獨樹一幟，發出強烈的吶喊。他的筆，是投槍，是匕首，是戰鬥的武器。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醜惡，喚起了國民的覺醒。

魯迅先生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著作將永遠指導我們前進。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發揚他的革命精神，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鬥。

「這樣的戰士」

魯迅先生逝世了，這是一場民族的大悲劇。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一生。他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堅強的意志。在黑暗的年代，他獨樹一幟，發出強烈的吶喊。他的筆，是投槍，是匕首，是戰鬥的武器。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醜惡，喚起了國民的覺醒。

魯迅先生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著作將永遠指導我們前進。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發揚他的革命精神，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鬥。

關於魯迅

魯迅先生逝世了，這是一場民族的大悲劇。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一生。他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堅強的意志。在黑暗的年代，他獨樹一幟，發出強烈的吶喊。他的筆，是投槍，是匕首，是戰鬥的武器。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醜惡，喚起了國民的覺醒。

魯迅先生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著作將永遠指導我們前進。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發揚他的革命精神，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鬥。

向魯迅先生致敬

魯迅先生逝世了，這是一場民族的大悲劇。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一生。他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堅強的意志。在黑暗的年代，他獨樹一幟，發出強烈的吶喊。他的筆，是投槍，是匕首，是戰鬥的武器。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醜惡，喚起了國民的覺醒。

魯迅先生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著作將永遠指導我們前進。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發揚他的革命精神，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鬥。

紀念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逝世了，這是一場民族的大悲劇。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一生。他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堅強的意志。在黑暗的年代，他獨樹一幟，發出強烈的吶喊。他的筆，是投槍，是匕首，是戰鬥的武器。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醜惡，喚起了國民的覺醒。

魯迅先生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著作將永遠指導我們前進。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發揚他的革命精神，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鬥。

餘瀝

魯迅先生逝世了，這是一場民族的大悲劇。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中國民族解放而奮鬥的一生。他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堅強的意志。在黑暗的年代，他獨樹一幟，發出強烈的吶喊。他的筆，是投槍，是匕首，是戰鬥的武器。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社會的黑暗和人性的醜惡，喚起了國民的覺醒。

魯迅先生逝世了，但他的精神永存。他的著作將永遠指導我們前進。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發揚他的革命精神，為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繁榮而努力奮鬥。

偉大的認識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怎樣紀念魯迅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魯迅先生遺像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編譯魯迅的戰鬥方法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紀念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嚴肅與正派及蒼涼與盡心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東方的巨人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文章開頭寫道：『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這是一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週年特輯

用敵人的血洗去我們底悲哀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 何文



魯迅先生遺像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民族而戰的一生，是為真理而戰的一生。他的死，是民族的損失，是國家的損失。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

首先，我們應當紀念他的精神。魯迅先生的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的脊梁。他的精神，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精神，發揚他的精神，使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其次，我們應當紀念他的事業。魯迅先生的事業，是民族的希望，是國家的前途。他的事業，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當繼承他的事業，發揚他的事業，使他的事業永垂不朽。

最後，我們應當紀念他的遺產。魯迅先生的遺產，是民族的遺產，是國家的遺產。他的遺產，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產，發揚他的遺產，使他的遺產永垂不朽。

紀念魯迅

面頰黑瘦其瘦的體道作家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民族而戰的一生，是為真理而戰的一生。他的死，是民族的損失，是國家的損失。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

首先，我們應當紀念他的精神。魯迅先生的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的脊梁。他的精神，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精神，發揚他的精神，使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其次，我們應當紀念他的事業。魯迅先生的事業，是民族的希望，是國家的前途。他的事業，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當繼承他的事業，發揚他的事業，使他的事業永垂不朽。

最後，我們應當紀念他的遺產。魯迅先生的遺產，是民族的遺產，是國家的遺產。他的遺產，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產，發揚他的遺產，使他的遺產永垂不朽。

紀念魯迅先生的真正意義

魏君整理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民族而戰的一生，是為真理而戰的一生。他的死，是民族的損失，是國家的損失。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

首先，我們應當紀念他的精神。魯迅先生的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的脊梁。他的精神，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精神，發揚他的精神，使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其次，我們應當紀念他的事業。魯迅先生的事業，是民族的希望，是國家的前途。他的事業，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當繼承他的事業，發揚他的事業，使他的事業永垂不朽。

最後，我們應當紀念他的遺產。魯迅先生的遺產，是民族的遺產，是國家的遺產。他的遺產，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產，發揚他的遺產，使他的遺產永垂不朽。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民族而戰的一生，是為真理而戰的一生。他的死，是民族的損失，是國家的損失。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

首先，我們應當紀念他的精神。魯迅先生的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的脊梁。他的精神，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精神，發揚他的精神，使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其次，我們應當紀念他的事業。魯迅先生的事業，是民族的希望，是國家的前途。他的事業，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當繼承他的事業，發揚他的事業，使他的事業永垂不朽。

最後，我們應當紀念他的遺產。魯迅先生的遺產，是民族的遺產，是國家的遺產。他的遺產，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產，發揚他的遺產，使他的遺產永垂不朽。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民族而戰的一生，是為真理而戰的一生。他的死，是民族的損失，是國家的損失。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

首先，我們應當紀念他的精神。魯迅先生的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的脊梁。他的精神，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精神，發揚他的精神，使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其次，我們應當紀念他的事業。魯迅先生的事業，是民族的希望，是國家的前途。他的事業，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當繼承他的事業，發揚他的事業，使他的事業永垂不朽。

最後，我們應當紀念他的遺產。魯迅先生的遺產，是民族的遺產，是國家的遺產。他的遺產，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產，發揚他的遺產，使他的遺產永垂不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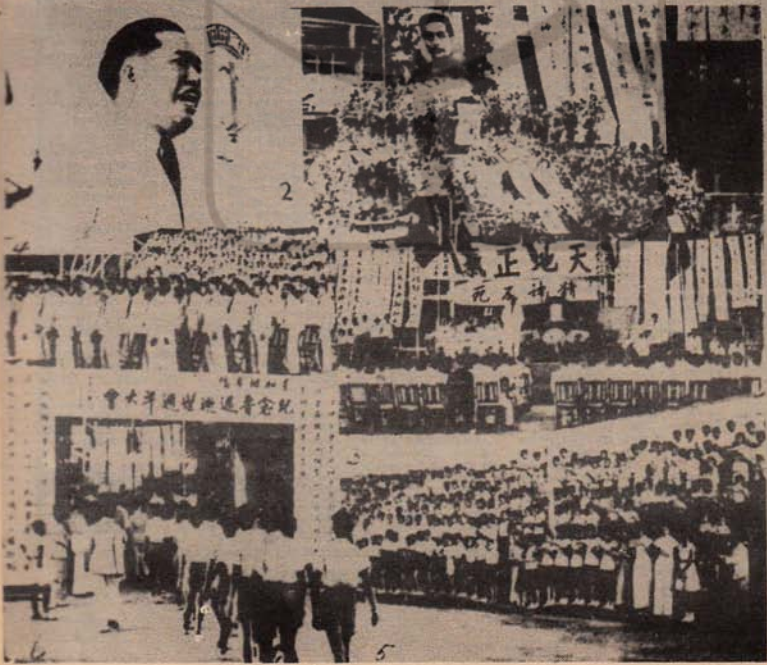
魯迅先生逝世一週年紀念，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魯迅先生的一生，是為民族而戰的一生，是為真理而戰的一生。他的死，是民族的損失，是國家的損失。我們應當怎樣來紀念他呢？

首先，我們應當紀念他的精神。魯迅先生的精神，是民族的靈魂，是國家的脊梁。他的精神，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精神，發揚他的精神，使他的精神永垂不朽。

其次，我們應當紀念他的事業。魯迅先生的事業，是民族的希望，是國家的前途。他的事業，是我們的理想，是我們的目標。我們應當繼承他的事業，發揚他的事業，使他的事業永垂不朽。

最後，我們應當紀念他的遺產。魯迅先生的遺產，是民族的遺產，是國家的遺產。他的遺產，是我們的財富，是我們的動力。我們應當繼承他的遺產，發揚他的遺產，使他的遺產永垂不朽。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週年大會。一、開幕及各界紀念之開幕及輪詢。二、主席致詞。三、各界代表發言。四、各界代表致謝。五、各界代表致謝。六、紀念魯迅先生逝世週年大會之會場外觀。



紀念魯迅先生特刊

星華文海傳

刊首

魯迅先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本刊特刊，旨在紀念魯迅先生，並藉此機會，對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對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作一初步的介紹。本刊特刊，共分三大部分：一、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二、魯迅先生的文學創作；三、魯迅先生的文學批評。本刊特刊，將於本月十八日出版，每日出版一頁，共計三頁。

紀念導師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本刊特刊，旨在紀念魯迅先生，並藉此機會，對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對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作一初步的介紹。本刊特刊，共分三大部分：一、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二、魯迅先生的文學創作；三、魯迅先生的文學批評。本刊特刊，將於本月十八日出版，每日出版一頁，共計三頁。

不只紀念而已

魯迅先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本刊特刊，旨在紀念魯迅先生，並藉此機會，對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對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作一初步的介紹。本刊特刊，共分三大部分：一、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二、魯迅先生的文學創作；三、魯迅先生的文學批評。本刊特刊，將於本月十八日出版，每日出版一頁，共計三頁。

後

魯迅先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本刊特刊，旨在紀念魯迅先生，並藉此機會，對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對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作一初步的介紹。本刊特刊，共分三大部分：一、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二、魯迅先生的文學創作；三、魯迅先生的文學批評。本刊特刊，將於本月十八日出版，每日出版一頁，共計三頁。

魯迅文壇的迅意

魯迅先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本刊特刊，旨在紀念魯迅先生，並藉此機會，對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對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作一初步的介紹。本刊特刊，共分三大部分：一、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二、魯迅先生的文學創作；三、魯迅先生的文學批評。本刊特刊，將於本月十八日出版，每日出版一頁，共計三頁。

貴假藥者的真面目

魯迅先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本刊特刊，旨在紀念魯迅先生，並藉此機會，對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對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作一初步的介紹。本刊特刊，共分三大部分：一、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二、魯迅先生的文學創作；三、魯迅先生的文學批評。本刊特刊，將於本月十八日出版，每日出版一頁，共計三頁。

之圖

魯迅先生，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他的逝世，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重大損失。本刊特刊，旨在紀念魯迅先生，並藉此機會，對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及其對中國文學運動的貢獻，作一初步的介紹。本刊特刊，共分三大部分：一、魯迅先生的生平事蹟；二、魯迅先生的文學創作；三、魯迅先生的文學批評。本刊特刊，將於本月十八日出版，每日出版一頁，共計三頁。

魯迅對馬華文藝的影響

(1930—1948)

一、

魯迅是對馬華文藝影響最大、最深、最廣的中國現代文學家。作為一位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魯迅對於馬華文藝的影響，不僅是文藝創作，而且也遍及文藝路線、文藝工作者的世界觀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不僅是馬華文學工作者深受魯迅的影響，就是馬華的美術、戲劇、音樂工作者，長期以來也深受魯迅的影響。不僅是在文學藝術領域，就是在星馬社會運動的各條戰線，魯迅的影響也是巨大和深遠的。長期以來，確切地說，自魯迅逝世後的四十年，魯迅的高大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為正義的事業而奮鬥。魯迅一直是本地文藝工作者、知識分子學習的光輝典範。我們找不到第二個中國作家，在馬來亞享有象魯迅那樣崇高的威信。

魯迅的一生，是偉大、光榮、戰鬥的一生。魯迅的著作，充滿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表現了一位正義作家跟人民敵人血戰到底的大無畏英雄氣概，包括了精深博大的進步的思想，對於進行反殖反封建的馬來亞人民是極大的鼓舞和啟發，是馬來亞人民爭取民主與自由的銳利思想武器。

鲁迅是文艺工作者、知识份子的光辉典范。马来亚文艺工作者长期以来一直把鲁迅当作自己的学习榜样，马来亚文艺工作者不仅向鲁迅学习文艺写作，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还向鲁迅学习好思想好作风，以鲁迅作为知识份子改造世界观的榜样。

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彻底革命的精神，敢于跟旧文化、旧传统彻底决裂的精神，反潮流的精神，勇于自我批评（解剖自己比解剖别人还要严）的精神，在马来亚人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长期以来，“向鲁迅学习”，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口号，而且也是整个民众运动的口号。鲁迅的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仅是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也是所有为人民而奋斗的人们的座右铭。

二、

鲁迅的作品早在二十年代已受到马华文艺界的重视，然而，把鲁迅当作导师，当作光辉的典范，那是三十年代的事。那时，也并不是所有的进步马华文艺工作者都对鲁迅有正确的认识（当然，只能要求基本上正确的认识），或把鲁迅当作导师和伟大的战士。二十年代末期及三十年代初期，有一些马华文艺工作者，其中包括相当多初步接受先进思想的人，对鲁迅或者是不十分尊重，或者是相当尊崇但对鲁迅的认识却是片面的、不深刻的，甚至有些是误解了鲁迅，错误地评价了鲁迅。接下来，我们尝试引录二十年代末期及三十年代初期一些“新兴文学”的提倡者的言论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位署名“陵”的作者于一九三〇年写道：

“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了青年们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年来中国的文艺，绝对没有能向前一步的铁证。本来，象他们那样过重乡土风味的作家，承接十九世纪左拉自然主义余绪的肉感派的东西，那里能卷起文艺狂风……”（《文艺的方向》，载于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九日星洲日报副刊《野葩》。）

把鲁迅说成是什么“乡土派”作家，甚至硬把鲁迅同资产阶级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扯在一起的人，当时，还不只这位作者。还有一位署名“悠悠”的作者，在提倡新兴阶级的文艺的同时，也附和上述作者陵的意见，甚至连鲁迅的作品也否定了。他说：

“事实上很是明显，鲁迅不是普罗文艺（即无产者文艺——引者注）的作家，他与普罗文艺是站在敌对地位的。是的，鲁迅过去的作品很有一点底价值，但过去毕竟成了过去，过去的文艺只有适合过去的社会，当然不适合于现在的社会了。现在所需要的是普罗文艺，鲁迅既不是普罗文艺的作家，我们只当他是博物院的陈列品。”（载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四日《野葩》）

这些初步接受了先进思想的作者，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具有严重错误的非议呢？这个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察：

1. 鲁迅的思想在一九二七年年中以后已有飞跃式的发展。但是，在海外，鲁迅作为一名左翼作家的事实，恐怕是一九三〇年三、四月间才被注意到的。这一年三月二日，鲁迅参

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到这时，鲁迅被中国左翼作家共同承认为领导人。然而，在此之前，鲁迅曾与创造社进行了一场论战。当时，创造社中一群小资产阶级激进作家，自以为学得了先进理论，在提倡“无产者革命文学”时，错误地对鲁迅进行了攻击，什么“封建遗孽”“世故老人”这些恶言恶语，都针对鲁迅发出。创造社中的这些人对鲁迅的错误的攻击，在马来亚也引起了反应，造成了对鲁迅的误解，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其实，鲁迅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三〇年所写的好多篇文章及所做的演讲，从没有如创造社所指责的那样，“反对”过革命文学。鲁迅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篇演讲（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中，就对革命文学做了比创造社的“才子”们深刻得多的分析。在一九二九年所写的《流氓的变迁》《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都闪烁着先进思想的光辉。《流氓的变迁》一文中对《水浒》的一针见血的批评，如今已被人们所熟悉和传颂。当时，中国上海的报刊是有在马来亚出现的，许多马华文艺工作者经常阅读上海出版的刊物、报章，相信他们是有看到鲁迅当时发表的这些文章的。创造社的文章他们有机会读到，鲁迅的文章没有理由读不到吧！当然，看到鲁迅的文章是一回事，重视不重视，肯不肯虚心学习又是另一回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马华文艺工作者都深受创造社中的某些人的影响，对鲁迅存有严重误解。然而，把鲁迅当作一位文艺

导师与左翼文艺的领导人的人，在一九三〇年以前，毕竟是少之又少。

2.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〇年在马华文坛上兴起的新兴文学，很迅速地取得了主流的地位，是当时文艺运动的主导。这股新兴文学之风，虽说是直接受到中国创造社、太阳社的影响与激发，然而，它毕竟是在马来亚社会上兴起的。新兴文艺作品，是在马来亚这个土地上萌芽、成长与开花结果的，因此，它必然带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与中国的革命文学有许多不同。在新兴文学运动时期所产生的一些作品，在马华新文学史上仍有相当高的地位（如海底山的《拉多公公》），提倡新兴文学的许多作者，看问题也不如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才子那么偏激与片面，踏实苦干、切切实实做出一些象样的工作的人仍不在少。因此，对鲁迅的一些错误的抨击、非议，也没有象在中国文艺界那样流毒极深。一些在一九三〇年前后非议鲁迅，说鲁迅是“过时”人物的马华文艺工作者，后来很快就抛掉自己的错误看法了。

3. 我们不能把当时一些作者对鲁迅的看法有错误，有偏差，全都归结为中国创造社、太阳社的某些人的影响，应当看到，当时马华文艺界中的一些初步接受先进理论的人，本身的观察方法与思想方法也有毛病，自己的思想水平实际上不高——但写文章时发表的言论都是相当激进。对创造社、太阳社中的某些人对鲁迅的错误攻击，本应进行具体分析，而不应当简单地、全盘接受过来。对于别人错误的东西不予以分析、批判，全盘收下，还当作正确的东西来传播，这难道能全部归咎

于别人吗？自己也有不小的责任的。何况，在一九二七年以后（鲁迅到上海以后），特别是在一九三〇年以后，鲁迅的思想有了显著的进步，并写了许多闪烁着先进思想光辉的杂文，这些杂文，大都收入鲁迅一本很重要的集子《二心集》里头。马华文艺界是有机会读到鲁迅这些文章的，因为当时上海的刊物，报章及书籍多半都能在星马看得到。如果不以旧的印象来看待鲁迅的话，是不难觉察到他的思想的重大飞跃的。

三、

一九三〇年二月，鲁迅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工作，三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又是主要发起人与领导人，并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以后，鲁迅就以一个左翼作家的姿态，旗帜鲜明地为新兴阶级而英勇战斗，受到中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景仰。马华文艺界已有不少人把鲁迅当作导师，在写作时不时引用鲁迅的话以加强自己的论据，或以鲁迅的话作为自己分析问题的指针。这种现象，到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更为普遍。

在三十年代中期，马华文艺界不少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熟读鲁迅的书，学习鲁迅的思想与斗争经验。在这一方面，当时有一位文艺工作者有十分突出的成绩，这位文艺工作者以写文艺评论称著，他就是丘康（又署马达、太阳）。他是那个时期对鲁迅的战斗精神有很深刻的认识、学习鲁迅学得较好的一位。由于认真向鲁迅学习，认真学习哲学与社会科学，使他成为当

时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

一九三五年杪，周扬一伙提出“国防文学”，企图取消先进阶级对文艺运动的领导，叫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在蒋介石政权的“国防文学”旗帜下联合起来。这些人根本抹煞了抗日爱国运动是争取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其目标决不是维护旧政权。在马华文艺界，有人把“国防文学”的口号搬过来，企图在马华文坛上贯彻。由于周扬、田汉、夏衍等一伙人的真面目还没有彻底暴露，他们又窃据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相当一部份的领导权，并且把持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俨然以文艺界的“元帅”自居，马华文艺界有相当多人仍把周扬一伙人当“元帅”或“重要理论家”，对于“国防文学”这一背弃进步立场的口号的反动实质缺乏深刻的分析，就接受过来了。最初，马达也曾支持这个口号。后来，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正确的、战斗的口号传到马来亚，马华文艺界曾对“两个口号”问题进行过辩论。马达、曾艾狄等马华文艺工作者是倾向于鲁迅的口号的。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发表了重要长文《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这是一篇彻底批判与清算周扬一伙的“国防文学”的历史文献。这篇重要文章传到马来亚之后，许多原先对“国防文学”的反动实质看不清的文艺工作者，都因为读了它而心明眼亮起来，有如云雾消散，重见天日。马达当时就是看了这篇重要长文之后，写了不少文章拥护鲁迅，并谴责周扬、徐懋庸一伙人的“无行”；还有其他作者，如丘家珍、曾艾狄、豫观等，都不再一面倒地支持“国防文学”。马达在《对〈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意见》

一文中，针对周扬一伙这样写道：“……有些作者，象周扬，已和田汉们一起的，他们一掌遮天要将‘国防文学’的口号包办一切，连自身的阶级出处也不明了，用意在于模糊阶层意识的。那种关门主义恶劣倾向是值得鄙弃的。”（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第二九九页）

当时，中国文艺界的许多人，尽管有不同意见“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但是，由于提倡“国防文学”及其后为这一口号叫好的人，在当时上海文艺界及进步阵营内颇有“权威”（如刘少奇、陈伯达等当时就亲自撰文，支持周扬等人）。所以，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国防文学”这一口号还在一些有进步倾向的作家当中贯彻执行。马华文艺界不免也受到一些影响。然而，可贵的是，马华文艺界中的先进份子，在鲁迅的战斗口号影响下，在鲁迅的光辉思想指引下，在文艺实践中并没有大力贯彻“国防文学”，而是根据当时马来亚社会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个与鲁迅的战斗口号很接近的口号：“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由于当时进步文艺面对很大的政治压力，凡“革命”的字眼都不能在报章上出现，当时，提到鲁迅的口号时，“革命”二字不是用“××”，就是用省略号代替，因此，“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基本上是与鲁迅所提的口号一致的。在今天搞文艺的人们，当能体谅当时文艺先辈们的苦衷。马华文艺界当时也有把这个口号写作“反封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或“马来亚的新文学”。

关于这一口号的提出的意义，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的《导言》里有很好的说明，他说：“反封

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是一个“着重思想内容，强调反封反殖的创作口号，也是马华文学思潮的一个发展。马华新文学扩展期的新兴文学思想潮流，在低潮时期的最初几年，简直陷于中断的状态，一直到上述口号提出前后，才算是被衔接上了。”

以我个人看法，马来亚当时仍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马来亚人民当务之急是争取民族解放，在马来亚搞“国防文学”是尤为荒谬的，我们实际上是无“国”可“防”。因此，就马来亚的情况来说，鲁迅先生的口号也是最正确的，最切实的。

“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在马来亚提出不久，鲁迅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就从上海传来了。马华文艺界对于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逝世表示了极大的悲痛。在鲁迅逝世后的短短几天内，星马各华文报章发表了大量向鲁迅致哀与致敬，号召人们向鲁迅学习的文章。《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光华日报》《中华晨报》都在那时出鲁迅纪念专号。这些报刊的文艺作者尽管对鲁迅的认识有深浅的不同，但是，对这位伟大战士的尊敬则是一致的。

四、

鲁迅逝世后，马华进步文艺界对鲁迅的评价是更加一致了，而且是越来越高。岁月的流逝，不能冲淡人们对这位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怀念，更没有削弱他的光辉思想与业绩对马华文艺界的影响。

从鲁迅逝世到现在的四十年间，马华文艺界在每年十月间为纪念鲁迅逝世而举行的集会（纪念会、群众集会、文艺晚会等），大大小小，一时实在难以统计。马华文艺作者四十年来所写的纪念鲁迅的文章（不包括对鲁迅作品与思想的评论、研究及学习心得），以每年十篇计算（即以每年十月间出的逝世纪念特辑或专号上的文章为准），四十年来也有四百多篇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的噩耗传到马来亚，马华文艺界很快就有了强烈的反应。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各报发表的纪念文章有数十篇之多（包括许多纪念专号）。关于这方面的详情，笔者另有专文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鲁迅先生逝世后的一年，马华文艺界及其他社会人士联合进行了好多纪念活动，成为一时之盛。根据马达所写的《一九三七年马华文艺界》（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出版史料》），我们知道在一九三七年，星洲有“鲁迅周年祭”，怡保有“鲁迅周年祭座谈会”，星洲有“鲁迅先生诞辰纪念会”（在九月间举行）。此外，怡保文艺界人士在王庆之发动之下，筹款建立“树人图书馆”（鲁迅原名周树人），以纪念文艺界的“伟大导师鲁迅先生”（马达语）。怡保文艺界还倡导成立“树人夜学”。在檳城与实吊远（在吡叻州）的文化界人士还募集“鲁迅纪念基金”，檳城成绩最好，汇出叻币约千元以上，实吊远不及百元，怡保与吉隆坡各汇出百多元，星洲及各地自动寄汇的款项也不少。

鲁迅逝世以后的几年，在马华文艺作者当中，有不少人相当认真地阅读鲁迅的著作，写了不少学习心得；马华文艺作者

在写作时引用鲁迅的话的现象也相当普遍，这不是为了趋时，而是表示大家要按鲁迅先生的教导办事。丘康所写的《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发表在《星洲日报》一九三九年新年特刊），有几段文字颇能说明从鲁迅逝世后到马来亚沦陷前几年间，马华文艺界对鲁迅的崇敬及鲁迅精神对马华文艺工作者的深刻影响：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文学之父，所有进步阶层的代表者，对于鲁迅先生是极推崇的。……”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两年多了，在中国，目前正开展的局面，是鲁迅先生的预示，这种预示，取得了千千万万的崇拜者，他已经不只是文艺界的领导者，实际可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了。马华文艺界从他逝世之日起，纪念的方式，出特辑，开会纪念。象中国鲁迅先生学院，及编辑《鲁迅全集》之类的，则有筹备已久的树人图书馆，据说这筹备手续行将告终，不久即可开幕了。……本来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便有多起集款汇寄鲁迅学院（即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因为这学院不特纪念了鲁迅先生，同时，更和民族解放运动相连系。

“鲁迅先生的精神，活着，永远活在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心里。”（引自《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第五〇五至五〇六页）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了！日本军队的南侵，威胁到美英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华南、华东的利益——尤其是英国的利益，因此，英国做出了较强的反应。在马来亚，英殖民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不象以前那

么严厉地压制反日运动。从一九三七年七、八月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这段日子，是马华新文学的繁盛时，（参阅方修著《马华新文学简史》第一百四十八页）。当时，马华文艺界都统一在援华抗日的运动中，出现了空前的大团结、大繁盛的生动活泼的局面。到了一九四一年，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魔爪向东南亚地区挥舞，马来亚人民的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保卫马来亚，为马来亚人民的生存权利与自由更生而战斗，成为社会运动的最重要任务。援华抗日运动就发展成马来亚人民争取自身的自由与更生的运动了。马华文艺界中的先进份子，紧跟着这一时代的潮流奋勇前进。在这个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艺评论家、诗人、音乐家、戏剧家等。处在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战斗的时代，马华文艺工作者更深切地感到向鲁迅学习的必要，当时，大家要强调、要突出的，就是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例如一位作者说：“学习鲁迅并不仅是学习鲁迅先生的行文措词造句，主要的是学习鲁迅先生那种泼辣的英勇的战斗精神”。（楚琨：《〈读了郁达夫的几个问题〉附言》，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另一位作者说：“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认清鲁迅先生的文章的精髓、那精髓就是‘一路走来那种反托派汉奸，反洋场恶少，反颓废份子的战斗精神’……我们现在需要的正是鲁迅先生一样的战斗精神。”（《我们对你却仍觉‘失望’》见《马华新文学大系（二）·理论批评二集》第四六一页。当时，马华文艺界的一些年青作者对郁达夫先生有不小的意见，“你”即指郁达夫。）

在这个时期，马华文艺界普遍上都相当重视鲁迅后期的思

想，重视鲁迅最后十年的光辉业绩。鲁迅在一九三〇年二月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以及一九三六年所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论我们现阶段的文学》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更是作为当时马华先进文艺工作者的锐利思想武器，许多作者写作时，都引用这几篇文章中的重要论断，作为文艺工作的指南。在此之前，马华文艺界对鲁迅精神的认识还是不深刻的。鲁迅先生逝世后的几年，马华文艺界对鲁迅先生的伟大，有了更好、更深的认识，对鲁迅精神的学习也更加认真，更加切合马来亚社会运动的实际。

五、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南侵，次年二月，全马（包括新加坡）沦陷。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正式投降，马来亚人民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和战斗的岁月，并且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马华文艺界，有些人做了马来亚的周作人（日治时期在华北充当汉奸），有些人则发扬了鲁迅的坚韧战斗精神，在战斗的岗位上坚持工作，被日寇逮捕时，坚持原则，宁死不屈，不愧为鲁迅的子弟！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了，马来亚人民又投入了新的运动——争取独立的运动。在这项运动中，鲁迅继续作为一面鲜明的旗帜，引导和鼓舞人民为民主与独立而奋斗。鲁迅的彻底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有了进一步的发扬。

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九周年纪念，由于广大人民还没有重整家园，战争创伤仍在作痛，文艺队伍也未重整，马华文艺界没有搞大规模的鲁迅纪念活动。次年十月十九日，报上有些纪念文章发表，但是，纪念活动却很少，规模也不大。

一九四七年十月间，马华文艺界联合了各方民主力量，搞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鲁迅纪念活动。这次纪念活动似乎是集中在星洲举行，主要活动有出版纪念特刊，开纪念会及举行文艺晚会这三项。

纪念特刊是由“星华文协”编的，借《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版位刊出。这些纪念特刊的重心，仍是强调鲁迅的战斗精神。“星华文协”在纪念特刊写的《刊首语》这么说：“今天，我们在这沉痛的日子里，纪念他（鲁迅），出特刊，那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我们要通过纪念他，去学习他，要通过纪念他，去坚强自己。因为现实告诉我们，他追求的理想，还没有实现，他‘横眉冷对’的敌人，还没有倒下去，正在加倍的疯狂。这便是发刊的意义和动机，最后我们提出：

“纪念他，要展开鲁迅的研究！”

从“星华文协”所编的两个纪念特刊（一刊在《星洲日报》，占半版；一刊在《南侨日报》，占全版），可以看出，当时有相当多马华作者，较多关注中国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纪念鲁迅的许多文章，仍缺乏一种以马来亚为重心的精神。个别作者的文章，强调了要发扬鲁迅精神为本地社会的进步而奋斗，这是

很可贵的。例如刘思写的《纪念导师几点意见》，有这样的意见：“现在东南亚弱小民族运动，正象怒涛拍岸，奔腾澎湃，那末不是更应该让鲁迅先生的宏亮声音，去增添它的声势么？是的，一切弱小民族运动的进步的虚心的战士，必然会接受鲁迅先生的训诫的，尊重他的意见和迎迓他的来临的，让光辉的鲁迅之旗，也在西南太平洋上空飞舞吧！”指出鲁迅精神是所有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人民都应该学习与发扬的伟大精神，并强调鲁迅不仅是属于华人社会的，而且是属于所有被压迫的民族的，这是马华文艺工作者研究与学习鲁迅不断深入的反映。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洲各界代表在小坡余街的海员联合会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出席的人有几百名，大会主席是当时著名作家金丁。在大会上讲话的有著名政论家胡愈之、文化工作者张昆与吴昆华、职工总会代表谢仪、妇女联合会代表伍亚雪及战剧界人士杨嘉、教育界人士薛永黍等。胡愈之的讲话强调：“鲁迅不仅是中国翻身的导师，而在整个亚洲亦然，他永远代表被压迫人民说话，对民族问题（的主张）是一切平等，教人不要做奴隶。”职工总会的代表指出：鲁迅也教育了劳苦工人，他呼吁大家以实际的行动纪念鲁迅。妇联代表强调必须面对马来亚的现实。（根据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星洲日报》的报道）

这一天晚上七时，在大世界游艺场举行的“纪念鲁迅文艺晚会”，表演的节目有十五个之多，歌、舞、话剧都有。二十一日同样的时间与地点，又有同样的晚会。这是马华文化艺术界搞的第一次纪念鲁迅的盛大演出。

所有这些纪念活动，都生动有力地说明了：鲁迅先生的伟大精神是多么令人景仰，多么深入人心。鲁迅先生一直活在马来亚人民的心中。

一九四八年六月，英国殖民当局在全马厉行“紧急法令”，所有公开的进步民主力量都受到严厉的镇压。这一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逝世的十二周年，人们只能在自己的内心纪念这位伟大的导师了。

六、

一九六七年九月



魯迅逝世在馬華文藝界的反應

魯迅先生是最受馬華文藝界崇敬的中國現代作家，他對馬華文藝的影響，是非常深廣的。可以說，沒有一個外國作家，其對馬華文藝的影響能跟魯迅相比。

今年十月十九日，是魯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紀念，筆者僅根據近幾個月來搜集的資料，講一講四十年前魯迅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傳到馬來亞來的時候，馬華文藝界對這件事的反應。希望這些資料，有助於本地文藝工作者和廣大愛好文藝的青年了解魯迅與馬華新文學的關係。

一、

三十年代中期，魯迅作為左翼文藝的領導人的地位已經確定，他公開了自己的進步立場，旗幟鮮明地為中國的勞苦大眾，為民族解放事業而英勇戰鬥。因此，他受到廣大中國人民和文藝工作者的崇敬，同時，也受到馬華文藝工作者的廣泛崇敬。

一九三六年上半年，在上海文藝界，有“國防文學”與“民

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鼓吹“国防文学”的周扬一伙人，不择手段地攻击和诬蔑高举“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战旗的鲁迅。鲁迅对这批混进进步阵营里的蛀虫十分厌恶，对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卖身投靠国民党政权的行径，尤其忍无可忍。鲁迅紧握笔杆子，同这伙蛀虫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同时，他也运用象匕首与投枪一样的杂文，深刻揭露国民党当权派不许人民爱国抗日，推行投降政策的罪行。

紧张、艰苦的生活，终于使鲁迅患了重病。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间，患病已半年的鲁迅先生终于完全病倒了。自此以后，病情越来越严重。鲁迅病重的消息传到马来亚，文艺界人士普遍表示关怀。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南鸿所写的《鲁迅先生的病况》（刊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六日《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

这篇文章的开头，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是相当正确的，以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说，是很难得的，作者这样写道：

“勇于正视人生，批评现实，愈老愈前进的青年导师鲁迅先生，他的言论几成中国文坛的灯塔，黑暗与光明正在斗争中的指路碑。……他所以能造成这种受时代青年崇拜的伟大地位，是有他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洞察时代潮流，同情挣扎在恶魔手下的群众，企图用他的正确的世界观，锐利的笔尖，指导青年，扫除一切私有制度的黑暗，而夺取光明的前途。……”

作者在文末说：

“……我们在道远的南洋，谨向被称为‘中国高尔基’的鲁迅先生，表示深切的慰问，并祝福他在‘导乘’的条件下益寿延年！”

这位作者对鲁迅的敬仰，对鲁迅的病况的关切，可以说代表了马华文艺界的大多数。

二

十月十九日，积劳成疾的鲁迅先生终于同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永别了，同全世界人民永别了！当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马来亚来时，在广大人民的心中引起了很大的悲痛。

鲁迅逝世的消息在十月十九日当天传到马来亚。当时，畅销星马各地的《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星洲日报》，都接到了由上海发来的电讯。第二天（十月廿日，星期二），各报都以显著位置，刊出了这个噩耗。

《南洋商报》在十月二十日于第二版刊出的消息是：

鲁迅病重逝世

享寿五十六岁

因写作过度所致

（上海电）以阿Q正传而名驰中外之中国名作家鲁迅（周树人），已于昨晨在上海医院病逝，享寿五十六岁，他曾患肺病多月，迨至本月十七日因写作过度，病况加剧一蹶不起也。

这段报导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写作过度”，自然不能很确切地说明鲁迅致病的全部原因。报导中的错误是说鲁迅“在上海医院逝世”，鲁迅是于十九日清晨九时病逝于寓所的。当然，这也不能怪当时《南洋商报》的编辑，那是上海拍来的电报（或电讯）文字有错，在新加坡的报馆编辑不可能很快查核，就把电文发排了。

《星洲日报》于十月廿日在第一版左下角刊出的报导是：

我国名作家
鲁迅在沪逝世
因在上星期著述过劳
以痼疾加剧遂告不治

〔上海〕名作家周树人（别署鲁迅）已于昨拾九日上午在沪寓逝世。遗下一母一妻及一子，周氏乃因在上星期内著述过劳，致痼疾加剧卒告不治。

（下刊鲁迅先生略历）

《星洲日报》在刊出这不幸消息时，还刊出鲁迅照片一帧。

《星中日报》于十月二十日在第二版刊出的报导是：

〔上海专电〕

名震世界之我国文坛权威

鲁迅昨在沪逝世

上周写作过劳老病加剧遂致不起

噩耗传出后各地智识界莫不悲悼

〔本报上海专电〕中国文艺作家思想界权威周树人，笔名鲁迅，已于昨晨在沪寓逝世。周氏于上星期因写作过劳老病加剧，遂致不起。遗下老母和妻儿。噩耗传出，中国各地智识界，感为震悼。周氏著作等身，小说《阿Q正传》，尤为人人传诵，各国亦有译本刊行。

（下刊出鲁迅生平及著作简介）

上述三报的报导，我以为《星中日报》的文字较好。标题与内文都较明确地指出了鲁迅在文艺界、思想界的地位。虽是新闻稿，但字里行间，流露较强的悲痛之情。

三、

鲁迅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星马之后，马华文艺界非常迅速地做出了反应。那时，正值日本军国主义者张牙舞爪，加紧对

中国进行侵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份子统治的意大利也在欧洲策动新的大战。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世界人民面临一场严酷的考验。在马来亚，由于仍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人民没有言论出版自由，再加上当时英国的张伯伦内阁对纳粹德国采取了所谓“绥靖政策”，纵容希特勒的侵略与扩张，妄图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东方，让纳粹德国去打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因此，在一九三六年间，英国对于马来亚人民的反日情绪不仅不鼓励，反而是百般压制，对于马来亚人民的援华抗日运动，也是诸多限制，深怕这一运动把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变成一股强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进步运动。当时，不少在廿年代末、卅年代初办得很出色的文艺副刊由于受到殖民当局的压迫而停刊，编辑被驱逐出境，一些原来活跃于文坛的作者也被迫沉寂下来。这是马华新文艺的低潮时期。（参阅方修著《马华新文学简史》第一〇八至一一〇页）

尽管政治气压很低，然而，马华文艺界先进者仍然尽了他们的力量，写了好多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出了好几个“鲁迅逝世纪念专号”或特辑，也搞了一些纪念活动。

是年十月廿二日（也就是鲁迅逝世的第四天），《南洋商报》的副刊《狮声》（当时颇有影响的一个文艺副刊）就刊出了梨涡写的《关于鲁迅的死》与紫凤所写的《文化界的大损失》二文。

这两篇文章，我以为就当时的水平（思想水平与文艺写作水平）来说，梨涡那篇写得很糟，作者东拉西扯，闲话一大篇，对鲁迅的逝世竟表现不出多大的悲痛。作者先谈鲁迅的死因是

“曾患肺病多月”，后“因写作过度”，以致“病况加剧而一蹶不起”。接着，作者设问：“他（鲁迅）为什么病后不好好的休养，偏要写作过度”呢？作者接着自己答道：“这可知社会对于一位职业作家的酬劳微薄，不加爱护，只有摧残；同时又可看出文人穷苦生活的一班了。假如鲁迅先生在英美法等国，一文登出，捞得丰足收入，那末，他的寿命总会延长多好些年月的。”

由这些话，人们不难看出，这位作者当时对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的认识是非常表面，非常不足的。试问，鲁迅作为一个旧世界、旧社会的无情与致命的批判者，怎么可能得到旧世界、旧社会给予他丰足收入呢？他怎么可能象西方的资产阶级作家那样，写些为旧世界涂脂抹粉的文章以博取“丰足收入”呢？鲁迅先生在当时享有很崇高的威信，那是人民大众给予的，是爱国进步力量给予的，是各国主持正义的人们给予的。

此外，作者还对鲁迅的杂文集《花边文学》中的许多篇文章，做了非常错误的解释。如说《玩具》一文是在“指出中国大人和孩子的没出息”，真是离谱到了极点。作者自称“鲁迅的所有杂感我大多数看过”，但是，他竟认为《花边文学》比其他的精彩。其实，比较集中代表鲁迅后期思想发展的是《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以及以《且介亭杂文》为名的三本集子。这位作者竟说《花边文学》比别的集子“精彩”，这说明了他本身思想水平不高。

相比之下，紫凤的那篇《文化界的损失》就写得象话，而

且也表现得很谦虚和老实，承认自己对鲁迅的作品阅读不多，体会不深。作者这样写道：

“说来惭愧！我对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除了《呐喊》、《野草》、《彷徨》和□二部杂感集而外（□是印刷脱漏的字，下同——引者按），其他的译著作品，我都很少熟读的机会，有之，亦偶然在友人的书案上，作片断的浏览而已。因此，在平时大家在刊物上高谈鲁迅的时候，或朋友闲谈之间，我都未能贸然亦跟着人家而‘谈鲁迅’。因为，我对他的认识太浅薄，……自然，他在文坛上地位的崇高，并非减少我这个渺小的人物去称赞他而会损其万一的尊严的。……”

接着，作者十分正确地指出了鲁迅和当时中国的爱国进步文艺家所受到的种种考验与政治迫害。作者写道：

“现代的中国文人的遭遇，可算是极人世间的悲惨！受尽了物质的压迫。还要受政治势力的戕害。□□、监禁、流亡，可算是家常便饭。鲁迅先生……这几年来，……总是过着流亡的生活。”

接着，作者引录了鲁迅的一首名诗（“惯于长夜过春时……”）说明鲁迅当时所受到的迫害。作者说：

“伟大的文人，他生前纵然受尽人们的压迫，黑暗势力的摧残！而经过了时代之禅变，那些压迫者，残害者却无声无臭，而伟大的文人，其作品和他的名字则永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作者的这番预言，如今已成为事实了。发表在同一个副刊的这两篇悼念文章，一优一劣，十分明显。这其实也正反映了

当时马华文艺界对鲁迅的认识程度之参差不齐。

《星洲日报》十月廿一日（鲁迅逝世后第三天）即在《晨星》版发表了《悼鲁迅先生》一文，作者是刘郎。文中引了不少何凝（瞿秋白）的话评价鲁迅。刘郎则称誉鲁迅为“一员英勇的战士”“一位优良的导师”。他还引录了鲁迅在逝世前一个多月写的《死》中所列的遗嘱七条，但未加以评论。

《星洲日报》的《晨星》从十月廿二日起，连载了陈烘所写的《纪念鲁迅先生》，副题是“读了他的杂感集后的掇拾”。这是一篇很长的读书笔记，作者详尽介绍了鲁迅后期所写的许多杂文，引录多而评论少。

四、

马华文艺界对鲁迅逝世的反应，集中于当时各报所出的“鲁迅纪念专号”上。这些专号都在短短的两三天内赶出来的，但全编得十分出色，有诗歌、照片、木刻、散文、评论等，数量之多，内容之充实，令人感动和钦佩，这是马华文艺界纪念艺术家最隆重，最庄严的一次。这些文章也反映了马华文艺工作者当时的昂扬斗志。

最先出专号是《星中日报》的副刊《星火》（在鲁迅逝世的第五天——十月廿三日）。专号刊出了四篇文章，都是作者在短短的两天内赶出来的。（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二十日刊在本地报章，《星火》的纪念专号廿三日出版，所有文稿应是在廿一、廿二日两天之内完成。）

这四篇纪念文章是：《吊唁群众的导师——鲁迅》（曙明）、《悼念鲁迅先生！》（副题“鲁迅先生的思想转变及其他”，作者陈培青）、《关于鲁迅先生》（崭新）、《悼鲁迅》（诗歌，作者辛辛）。

曙明的文章这样写道：

“这位为着祖国争取自由，为着世界争取和平的巨人，他虽然不能算是世界文化地图里的巨大山脉，但是他确是中国文化山脉的创造者和支撑者。他曾冲破在他四周的黑暗势力；他为中国文化开辟了光明的道路；他领导了现阶段的抗日救亡的文化阵线。……在昨天我还听得他号召战友们的号令，还看他在抗敌救亡的文化阵线里指挥作战，今天，就要叫我相信没有他的歌声；他的翅膀；他的号令；他的指挥了吗？我还在梦中祈待着他的教诲；新的战术呵！”

接着，作者摘录了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的几则，并呼吁文艺工作者遵照鲁迅的指示检讨自己的工作，改进自己的工作。

陈培青的《悼念鲁迅先生》有几段话也写得很好：

“鲁迅先生是一个伟大的战士……他在病中也坚强的提起了笔杆，向真理的大途展开着，一般的十足犯了错误的作家们，受了他的挚诚指正的，还不觉悟，如今他死了，我们希望这些作家们，若不是汉奸，不是走卒，他总有一天会觉悟，提起了真理的笔杆，反攻叛徒们，走向大众的救亡运动之联合战线上而工作着，……”

“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战士，在那时不是很多伟大的显过

身手的？现在还有几个呢？所以，鲁迅先生之能在五四时期的做一个思想革命的战士，现在，且能老当益壮的继续他的天才，在现阶段的文学运动中做一个指导者，试问，象这种人再有吗？”

辛辛的《悼鲁迅》诗，全文如下：

大地笼罩了黑暗的悲哀，
群星滴流凄清的眼泪；
伟大的人群的导师啊！
已离人群而长逝！

宇宙重穿上了麻衣，
群鸦哀鸣不已；
群鬼窃喜，人群哀伤！
伟大的人呵，你眠而长逝！

我们刚刚失去高尔基
现在又没有了你——鲁迅！
我们将踏着你留下的足迹；
向着旧世界的对方迈进！

我们刚刚失去了高尔基！
现在又没有了你——鲁迅！
看呵，新的世界中；

将从火山的烈焰中，拼出了真谛！

《星火》在十月廿四日续出的“鲁迅纪念专号”，又刊出了以下几篇文章：《鲁迅在中国的新文学堡垒中》（剑濡），《现代第一流作家鲁迅》（日本的鲁迅研究者佐藤春夫所发表的谈话），以及陈培青所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续文。此外，该版还刊出鲁迅于一九三三年拍的一张照片。

《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狮声》的“纪念鲁迅专号”于十月廿四日刊出，包括以下几篇文章：《悼鲁迅》（阿刺）《这样的战士》（阿生）《关于鲁迅》（焉求）《向鲁迅先生之灵致敬》（军笳）《纪念鲁迅先生》（二克）。该刊的编者紫凤在《余沈》中写道：

“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记者曾草一文，略致悲悼之忧！（按：指《狮声》十月廿二日刊出的《文化界的大损失》一文）同时并希望本刊诸同志，对于鲁迅的思想作品有精湛研究者，动笔写些纪念的文章！果然两日之间，即收到纪念文章多篇，这足见鲁迅先生之死，是如何震动着每个文化界份子的心呢！”

“现在，我们把它汇集起来，出一个纪念专号：一，聊表示我们的悲悼之意，二，使本刊的读者，知所认识新时代战士的奋斗精神，而奋然以起，肩担着人生正确的任务。——以鲁先先生为榜样。”

短短几百字，把出专号的经过，稿源及意义讲得相当清楚。

在《狮声》的纪念专号中，阿刺的文章在最后这样写道：

“我热烈的哭鲁迅，我痛恨一切迫害中国人的敌人，我深信他最近所领导的作家们和他亲手写成的文学口号是整个中国所正确要求的，最广泛最彻底的一个。”

这里提到的鲁迅所主张的口号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周扬一伙所提的“国防文学”是相对立的。在鲁迅逝世前，马华文艺界也曾针对这两个口号进行了一场论争。阿刺在这里表明他完全支持鲁迅所提的口号，这是值得注意的。

焉求所写的《关于鲁迅》，对鲁迅后期拥护社会主义，有明确的说明。作者写道：

“……在一九三〇年，他签名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受了浙江当局呈请中央通缉，同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在大会上曾有激昂的演说，此刻左翼作家已换了阵线，而鲁迅乃为其中忠实的一员。在中国，自己敢于公开承认是左翼，又能坚持其立场，恐怕并不多见，许多怕落伍，又怕遭殃的文人，作出□种依违两可的妾妇状，然而，他却不然，就这也可见鲁迅的人格了。”

阿生的《这样的战士》（副题“悲悼鲁迅先生”）有几段话也写得不错：

“鲁迅先生的最足令人羡慕的，是他做人的态度。虽无论处于怎样的险境，对威迫利诱，他始终抱着不投降，不妥协政策。

“他目击着当时军阀官僚戕杀文学青年的惨酷，而他自处更属危险，只要读过他追悼北平女生，和青年柔石的文章便可

知道其中情形。然而他并不因恐怖而退缩，反为愤怒，勇敢，挺着胸脯向前搏斗。”

这位作者对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有较深刻的认识，在好多篇悼念文章中，这篇文章突出的是鲁迅的这种“韧”的战斗精神。

在《狮声》的纪念专号中，文字比较流利，表达恰当严密，内容较充实与有深度的，该是二克写的《纪念鲁迅先生》这篇短文。在这篇只有一千二百来字的文章中，作者分析了鲁迅作为旧世界的伟大批判者的光辉业绩，也比较正确地道出了鲁迅的致病与逝世的因素。作者这样写道：

“我们在他的文学作品里头，无论那一篇，都可以看见充满着真情热血的文章，尖锐的笔杆下，把死寂臭腐的社会，尽量地暴露出来；同时把旧社会崩溃的必然性，怎样产生新社会的理论都详细地活现在纸上。……鲁迅先生可以说是真正的民族艺术家，普罗文艺的英雄了。我们从先生著的《呐喊》的自序里可以看出，当他青年时候的境遇，一直到现在不折不挠替社会服务的伟大精神。……”

“这一次先生致死的原因，虽是写作过度，以致病况加剧而一蹶不起。其实是为了国家民族斗奋（应是奋斗）而死。象这位与恶势力旧社会肉搏英勇的领导文化界展开救亡运动的领袖，他的死，怎不令我们悲悼！”

“青年导师，坚苦卓绝的斗士，于今永远地离开了动乱的社会，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们对这一位苦斗一生的战士底□要怎样来表示呢？写篇纪念的文章，出版纪念特刊就算尽了我

们的责任吗？不，我们需要努力地去继续他底遗下来的抗敌救亡未完的工作，百折百（应是“不”）挠的勇往直前和恶势力奋斗肉搏！

“鲁迅先生的死，给予展开了抗敌救亡阵线中的中国文化界固然是莫大的损失，而对他本身的生命，已算是完成了伟大的任务了。而他的遗志，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使中国的文化界，跟着民族解放运动，燃起异彩的火炬。”

《星洲日报》所刊出的纪念专号，文章多而长，洋洋大观，显得相当隆重。当时，《星洲日报》有个《文艺周刊》（逢星期日出版），在《文艺周刊》第四十八期（十月廿五日出生）出的“鲁迅纪念专号”有如下文章：《悼鲁迅先生》（流浪）《悼鲁迅先生》（诗，作者黄石）《纪念鲁迅先生》（诗，作者尚古）《悼鲁师》（诗，作者陈育嵩）《永别了，我们的鲁迅》（诗，作者昌琪）《弔鲁迅》（诗，作者王玉尧）《集体主义旗下的鲁迅先生》（马达）《理智的明灯熄灭了》（冰人）《纪念鲁迅》（荷花）《我们的战士——鲁迅先生》（羊羽）《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之父》（陈祖山）《悼鲁迅》（瑞元）。《文艺周刊》的纪念专号还刊出两张鲁迅的照片，两帧钟醒魂的木刻（一是《悼鲁迅先生》，一是《鲁迅先生像》），图文并茂，篇幅是两大版。编者哥空在《编后》中说：

“本刊为纪念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鲁迅先生，特出版这一期纪念专号，在短短数日的征稿时间里，收到各地文艺作者的稿件，竟在四十余篇之多，可足以证明鲁迅先生在荒炎的南岛文

坛上，已经得到一般青年作者深刻的认识了！同时也可知道南洋文艺路线今后的动向了。

“本刊因为篇幅的关系，未能一□即日刊出，这是应该请作者诸君愿（原）谅！但为表现诸君哀悼鲁迅先生之热忱起见，所未曾刊出之来稿，如有发表之可能者，当尽量继续发表！”

《文艺周刊》廿五日刊出纪念专号，次日，《星洲日报》的《晨星》又刊出四篇纪念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原是写给《文艺周刊》的纪念专号的，但因为文艺周刊的版位有限，才移到《晨星》来发表。这四篇文章是：《文艺工作者的鲁迅先生》（浪人）《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作者的名字看不清楚）《十字街头的鲁迅先生》（竹吟）《鲁迅先生悄悄的去》（静观）《我们要踏着 he 走过的血路》（侠魂）。

在这些纪念文章当中，我个人以为流浪与马达的两篇较有深度，内容也较重要。在那么多纪念鲁迅的文章中，这两篇文章对鲁迅的思想发展有很精辟的分析，对于当时的广大读者正确认识鲁迅很有帮助。

流浪的文章指出了鲁迅思想的前后两个时期的特点，内在联系及发展的情况。作者引用《二心集·序言》中的一段话，指出鲁迅后来成为劳苦大众阵营的伟大战士。

流浪的文章还提出了“怎样纪念鲁迅”的问题，他提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学习鲁迅对人生的态度。鲁迅对人生的态度是怎样的呢？作者说：“就是敢于正视现实和暴露现实的勇气。”作者进一步分析道：鲁迅“看不惯周遭的黑暗，他不愿

意做历来统治者的‘叭儿狗’，不愿意替历来的统治者当‘烟幕弹’，于是他一向便鼓着喉头‘呐喊’，揭穿历来的统治者的卑鄙与黑幕。”

第二，学习鲁迅的战斗方法。作者认为，鲁迅先生的战斗的方法是“要韧”。“韧”就是“持久战”的意思，也就是“一口咬住就不放”。作者也强调鲁迅反对“赤膊上阵”，提倡“壕堑战”，换句话说，就是要讲究策略。

第三，学习鲁迅的“镇定的精神”。这里，指的是鲁迅临危不惧，站着应战。

马达的文章，提出了当时中国文坛上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作者坚决支持鲁迅所提出的口号，并且热情地宣传鲁迅制定的文艺路线。作者强烈反对徐懋庸、周扬一伙提倡的“国防文学”，直斥徐懋庸是“关在国防文学的禁宫里”的家伙，并指责他们一伙干出“出卖灵魂的事体”来。作者还正确地把徐某与周扬一伙联系起来，当作一路货色。马达有一段话是这样的：

“他（鲁迅）在病中的关心，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站在正确的现实主义的立场，给以简明的指示，《答脱洛斯基派信》，站在联合路线的立场，把破坏联合的人们教训一顿。……在病愈之后，《……也是生活》里，更把周扬辈鼓吹赛金花式的救国，讽刺了。”

陈祖山对鲁迅的顽强战斗精神与坚持原则的精神也有较好的分析。他写道：

“……几年来，从事文艺工作的前进份子，没落的没落，

逃亡的逃亡，甚而至被敌人收买的收买，投降的投降，叛变的叛变了。然而我们的鲁迅先生，却就在这伟大的旧时代，抛弃了从前的怀疑家的态度（这里，作者对鲁迅的前期思想似乎认识不足——本文作者），跃进了最前卫的阵线，给一切反动的敌人以有力的投枪。六七年来，他给以我们的努力，可以说是获得了最最伟大的功绩。在他本人的生命史上，也可以说是一个最灿烂和最最光荣的时代。我们在过去，文艺界是一向没有一个真正的伟大指导者，从一九三〇年鲁迅先生的加进左联，以他有力的钢铁一般的文章，以他坚忍不屈的精神，这才真正的负起了我们领导者的责任。他不但给以反动的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同时对于自己阵营的投机，游移，一切不纯洁的份子，亦毫不留情地给以冷酷的教训，所以，鲁迅不但是中国新文学之父，而且是一个使我们可敬畏的‘严父’。”

侠魂的纪念文章很短，但是句句是力量。最后一段话是：

“我们要纪念我们英勇的导师，不要用眼泪，不要说空话，我们是实践他给予我们宝贵的教训，踏着他走过的血路，永远为追求人类的光明而斗争！那才是真真地在纪念我们的巨人鲁迅。”

各报的纪念专号刊出之后，纪念鲁迅的文章仍是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各报的副刊上，形成了一股纪念鲁迅、学习鲁迅的热流。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五日，《南洋商报》的副刊《文漫界》，刊出英浪刻的木刻《导师·鲁迅》，又刊出该刊编者戴隐郎写的《致敬》与新人作的《纪念因著述过劳而逝世的鲁迅》。另

有诗一首《悼导师鲁迅先生》，也是戴隐郎所作。这一天出版的《文漫界》，虽然没有“纪念号”的名目，但绝大多数的篇幅，都是与纪念鲁迅有关的。

从十月廿五日起一直到十一月，纪念鲁迅，向鲁迅学习，可说是《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星中日报》等报章的文艺副刊的重心。以下是不完全的统计（从十月廿六日至卅一日）。

《追忆鲁迅先生》（老张·刊于十月廿六日《狮声》）。

《鲁迅之遗闻轶事》（无署名·刊于十月廿七日《南洋商报》副刊）。

《哀悼鲁迅先生》（颖川·刊于十月廿七、八、九日《星中日报》副刊《星火》。这篇文章把徐懋庸一伙斥为“蚊子”“苍蝇”。强调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讲话的精神。）

《忆鲁迅先生》（古尔提·刊于十月廿七日《狮声》）。

《关于鲁迅的杂文》（纪清·刊于十月三十一日《星火》）。

从以上的史料，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鲁迅在当时马华文艺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毫无疑问的，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的中国作家。当时的马华文艺工作者，在政治气压很低的情况下，仍然排除万难，兴起了这么隆重而又热烈的纪念鲁迅、学习鲁迅之风，这种顽强奋斗精神，令我们无限钦佩！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完稿

作者补记：

写完上文之后，重新翻阅资料，发现漏了一些情况未述，兹补记如下：

1、鲁迅逝世后的两三天内，《星中日报》的文艺副刊《星火》刊出好多篇纪念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在极短促的时间赶出来的。十月廿一日的《星火》，有健人写的《追悼鲁迅先生》，廿二日又有胡桃写的《纪念我们的导师鲁迅》，鹤龄写的《救救孩子罢！》民宜辉写的《谈〈花边文学〉》。

2、当时，出专号哀悼鲁迅逝世的，除《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星中日报》外，还有《新国民日报》《光华日报》《中华晨报》等，因手头资料缺乏，未能详介。

魯迅致新加坡朋友的書信

过去，很少人知道鲁迅有个朋友在新加坡，鲁迅还写过几封信寄到新加坡来给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叫刘炜明。我们只知道他是广东人，当时侨居于新加坡。刘炜明的年龄、当时在新加坡的职业、住址，以及他怎么认识鲁迅，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希望中国与本地的鲁迅研究者能做点考据工作，弄清楚这些问题。

现在所知道鲁迅寄到新加坡给刘炜明的信有三封。第一封信写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第二封写于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三封写于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参看一九七六年八月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书信集》）。

第一封信的内文如下：

炜明先生：

昨天我收到了来信。这几年来，短评我还是常做，但时时改换署名，因为有一个时候，邮局只要看见我的名字便将刊物扣留，所以不能用。近来他们方法改变了，名字可用，但压迫书局，须将稿子先送审查，或不准登，或加删改，书局是营业

的，只好照办。所以用了旧名发表的，也不过是无关紧要的文章。

集合了短评，印成一本的，一共有三种，一就是《二心集》，二曰《伪自由书》，三曰《南腔北调集》，出版后不久，都被禁止，印出的书，或卖完，或被没收了。现在只有《伪自由书》还有，不知先生已见过否？倘未见，当寄上。

至于别的两种，我自己也无存书，都早给别人拿去了，别处也无法寻觅。倘没有人暗中再印，大约是难以到手的。但我当随时留心，万一可得，自当寄奉。

.....
迅上 十月卅一日

刘炜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信给鲁迅的呢？现在还不十分清楚。查阅《鲁迅日记》，是年十月三十日所记，有“得刘炜明信”句。三十一日所记，则有“午后复刘炜明信”句。现只能根据鲁迅这封信推想，刘当时在新加坡写信给在上海的鲁迅，想买鲁迅的近作，同时也想知道鲁迅的近况。鲁迅为了让海外的友人知道中国当时社会的黑暗，尤其是当权者对进步文化的压迫与摧残，所以在信中详述了上海文化界的情况。

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鲁迅又收到刘炜明从新加坡寄给他的信，鲁迅当天夜间就写了复信，信的内容如下：

炜明先生：

十五日惠函收到。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作为研究，看看也不要紧，不过深入之后，就容易受

其浸润，和现代离开。

我请先生不要寄钱来。一则，因为我琐事多，容易忘记，疏忽；二则，近来虽也化名作文，但并不多，而且印出来时，常被检查官删削，弄得不成样子，不足观了。倘有单行本印出时，当寄上，不值几个钱，无须还我的。

《二心集》我是将版权卖给书店的，被禁之后，书店便又去请检查，结果是被删去三分之二以上，听说他们还要印，改名《拾零集》，不过其中已无可看的东西，是一定的。

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那里还想到将来。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那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有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这种残酷的办法，一面固然出于当局的意志，一面也因检查官的报私仇，因为有些想做“文学家”而不成的人们，现在有许多是做了秘密的检查官了，他们恨不得将他们的敌手一网打尽。

星洲也非言论自由之地，大约报纸上的消息，是不会确于上海的，邮寄费事，还是不必给我罢。

.....

鲁迅 十一月二十八夜

查阅《鲁迅日记》，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条，记有“得刘炜明信，下午复。”

从这封信，我们又进一步知道这几件事：

1. 鲁迅谈了自己对读古书的看法，这恐怕是由于刘的来信问了这样的问题。

2 刘炜明要买鲁迅的近著，鲁迅十分热诚地为这位远地友人服务，尽管他老人家当时斗争任务十分艰巨繁重（所说的“琐事多”，其实指的就是这点），他仍不怕麻烦，四处寻找友人所要的书，而且是准备赠送给友人的，不收一个钱。

3 继续揭露当时中国文坛的黑暗，控诉当权者对进步文艺的压迫。这表现了鲁迅与黑暗势力血战到底的硬骨头精神。

4 对当时英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新加坡，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当时，刘炜明显然有意把新加坡的一些华文报章寄给鲁迅，作为参考，鲁迅怕麻烦朋友，所以请其免寄。

后来，刘炜明有没有将新加坡的华文报章寄给鲁迅呢？有的。那是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刘炜明从新加坡寄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星洲日报》给鲁迅。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了这件事：“得刘炜明信并《星洲日报》一日份。”四天之后，鲁迅就给刘写了回信，并且寄了两本书（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鲁迅日记》第921）。其中一本是《二心集》，另一本呢，日记与书信中都没有写明，据鲁迅著述出版日期的资料，很可能是《准风月谈》（此书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印成）。

这是我们所知道鲁迅致刘炜明的最后一封信，也是三封信之中最长的，内容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详尽地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反映了鲁迅当时的恶劣处境，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了鲁迅的顽强意志。鲁迅当时写这样的信给远在新加坡的朋友，除了帮助这位远地友人了解中国黑暗文坛的现状并表示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之外，还有鼓励友人追求光明，不怕困难去

奋斗的意思。相信马来亚文艺工作者对这封信会感到分外亲切和珍贵的。现将这封信的内容录后，供大家学习：

炜明生生：

十二日的信，早收到了；《星洲日报》也收到了一期，内容也并不比上海的报章减色，谢谢。《二心集》总算找到了一本，是杭州的书店卖剩在那里的，下午已托书店和我新印的一本短评，一同挂号寄上，但不知能收到否。此种书籍，请先生万不要寄书款来，因为我从书店拿来，以作者的缘故，是并不化钱的。

中国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从明年起，我想不再在期刊上投稿了。上半年曾在《自由谈》（《申报》）上作文，后来编辑换掉了，便不再投稿；改寄《动向》（《中华日报》），而这副刊明年一月一日起就停刊。大约凡是主张改革的文章，现在几乎不能发表，甚至于还带累刊物。所以在日报上，我已经没有发表的地方。至于期刊，我给写稿的是《文学》、《太白》、《读书生活》、《漫画生活》等，有时用真名，有时用公汗，但这些刊物，就是常受压迫的刊物，能出到几期，很说不定的。出版的那几本，也大抵被删削得不成样子。

今年设立的书报检查处，很有些“文学家”在那里面做官，他们虽然不会做文章，却会禁文章，真禁得什么话也不能说。现在我如果用真名，那是不要紧的，他们只将文章大删一通，删得连骨子也没有；我新近给明年的《文学》写了一篇随笔，约七八千字，但给他们只删剩了一千余字，不能用了。而

且办事也不一律，就如那本《拾零集》，是中央删剩，准许发卖的，但运到杭州去，却仍被没收，他们的理由是：这里特别禁止。

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但我是还要反抗的。从明年起，我想用点功，索性来做整本的书，压迫禁止，当然仍不能免，但总可以不给他们删削了。

.....

迅上 十二月三十一夜

从这封信看来，鲁迅对当时的《星洲日报》印象似乎不坏，相信这主要不是当时《星洲日报》的新闻版有什么特出——鲁迅已经在致刘炜明的前函讲过，新加坡报纸上的消息，不会跟上海报纸有什么大的差别，比不上高低。不过，当时《星洲日报》的副刊确实是相当出色的，能容纳大量有现实意义的稿件。如《晨星》、《繁星》、《文艺周刊》、《学海》等园地，培育了不少马华作家，刊出了不少优秀作品。

根据《鲁迅日记》，刘炜明在收到鲁迅这封信之后，曾再致函鲁迅，鲁迅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三日收到这封信。同年二月一日，鲁迅收到刘炜明寄下的书款五元。五日与六日，连续两天接到刘的信。四月二十七日，又得刘炜明一函。七月六日，复得刘炜明一函，在《鲁迅日记》中，这是最后一次提到刘炜明，此后，不再有刘致函鲁迅的记载。

鲁迅给刘炜明的信，是否仅此三封呢？如果根据《鲁迅日记》所记，就是这三封信了。但是，这是非常珍贵的远方来信，是研究鲁迅晚年战斗生活的重要文献。刘炜明是不是当时

在新加坡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他是一位文艺爱好者，而且对鲁迅先生相当崇敬，爱读鲁迅的书，这是可以肯定的，不然，他不会不怕麻烦，写信到上海去购买鲁迅的著作。刘炜明虽不是什么大人物，而且与鲁迅的友谊不是十分深笃（可能他们从没有见过面呢），但是，鲁迅先生却是如此热诚地为他服务。当时，鲁迅的一些书由于被禁，连他自己也没有，但是，他仍四处寻找，辗转找到刘炜明所要的书寄出，还耐其烦地向刘炜明讲述上海文化界的情况，这充份体现了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精神。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重写

馬華文化界

兩次盛大的魯迅紀念活動

魯迅先生逝世後，馬華文化藝術界人士為了表示對這位偉大文學家的懷念與敬意，為了激勵大家更好地向魯迅學習，更好地發揚魯迅精神，曾舉辦過好多次魯迅紀念活動。根據筆者所掌握的有限的資料，估計從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魯迅逝世到五十年代末，較盛大隆重的紀念活動有：

1.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以後的幾個月，有一系列的紀念活動。
2.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的魯迅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及當晚與二十一日晚之文藝晚會。
3.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的魯迅逝世十一周年紀念大會及當晚與二十一日晚之文藝晚會。
4. 一九五五年十月間的魯迅紀念活動（主要是各報章各雜誌出紀念專輯）。
5.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華文中學學生數千人分別在華僑中學及中正中學校園內舉行盛大的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晚會（有許多節目表演）。

進入六十年代，每年十月十九日前後，紀念魯迅的活動仍

有举行，不过，多数是分散的，小规模。

下面，根据《星洲日报》、《南洋商报》、《星中日报》及其他华文报章的报导，向大家介绍一九三七年及一九四七年的两次盛大的鲁迅纪念会的情况，这些材料，相信能帮助大家了解鲁迅对马华文艺的巨大、深远的影响。

一九三七年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马华文艺界、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以及其他各界人士，在大世界体育场举行了一个盛大、隆重的纪念大会。这是马来亚第一个盛大的鲁迅纪念集会，根据当地华文报章的报道，参加大会的人近二千名。

这次纪念大会是在中国人民全面抗战三个多月之后举行的。是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打进关内，张牙舞爪，要把整个中国置于他们的血腥统治之下。日寇的疯狂侵略行径，不仅严重地危害了中国的安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也严重地威胁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安全，破坏了亚洲和平。援华抗日，是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迫切任务。七·七事变之后，马来亚掀起了反对日本侵略的民众运动新高潮。纪念鲁迅的大会，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举行的。

纪念大会于下午五时举行，气氛庄严，仪式隆重，与会者的情绪很高。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

会场正中，有鲁迅的遗像，四周缀以生花，遗像下有三个

大花圈，花圈之下及遗像旁有许多輓联。会场的大门，则有横幅，上书“新加坡华侨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两旁有长联：

“生抱大无畏精神，暴露封建流毒，攻击社会蠹贼，老而弥笃，始终努力奋斗，长使青年齐敬仰”。

“举国正在真诚团结，收复领土主权，打倒民族敌人，武则用枪，文则用笔，展开全面抗战，緬维先觉是凭依。”

大会的程序如下：一、全体肃立；二、向国旗行鞠躬礼；三、唱国歌；四、向鲁迅先生遗像一鞠躬；五、默念；六、唱輓歌；七、主席致开会词（青年励志社）；八、报告筹备经过（茶阳励志社）；九、报告鲁迅先生生平史略（业余话剧社）；十、奏哀乐（爱华音乐队）；十一、演说（每人五分钟）；十二、唱輓歌；十三、散会。

大会主席是青年励志社的负责人胡守愚（当时任《星中日报》的编辑主任）。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纪念鲁迅，不在于形式上的纪念，而贵在学习鲁迅的奋斗精神。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一生不为恶劣势力所屈服，自始至终不断以最坚强的精神与恶势力搏斗，至死不渝，这是我们青年所应该学习的。

报告鲁迅生平史略的吴天，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他是三、四十年代马华戏剧界的重要人物，能写剧本和文艺理论，又是一名出色的话剧导演。他当时是新加坡业余话剧社的负责人。

各团体代表起立演说的有季之华、曾圣提、许侠夫与何亚莉（女）等。

查参加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的团体单位原有二十五个，另有一些单位是临时报到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日的《星洲

日报》(早报)刊出的参加单位名单如下:

(中国)驻星总领事馆、星中日报、上海书局、新国民日报、茶阳励志社、业余话剧社、星洲日报社、青年励志社、玉融别墅、总汇新报、民众学校、华人美术研究会、星岛周报、静方女学校、启发学校、民正学校、静方校友会、培青校友会、养正学校、菁莪学校、国语学院、中华公学、华侨中学、南庐学友会、香祖体育会、崇正学校、树人学校、石行工人互助会、华星建筑互助会、励新学校、育英学校、端蒙学校、福州会馆、致甲学校、还有许多海员与电车工友。从当时报章上刊出的照片可看到不少小学生在老师的率领下也参加了纪念大会，并且肃立唱挽歌。十来岁的少年，就有幸参加这么一个很有意义的大会，从而认识鲁迅精神，向鲁迅学习，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一九四七年的鲁迅纪念会及文艺晚会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日，马华文化界在这一天举行了一个隆重、热烈的纪念会。现根据一些旧报章的报道，把当时的情况介绍给大家：

纪念会是在当天上午十时假小坡余街(现京都酒店、中华书局小坡分局所在的街)海员联合会举行的。该会场地有限，容纳不了很多人，但到会的仍有数百人。这几百位热血的人们，怀着对伟大文学家鲁迅的崇敬心情，汇集在一起，把小小的会场挤得紧紧的。

出席纪念会不仅有文化艺术界的人士，还有职工总会，青年组织、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就参加纪念会的人数来说，是比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少，但就参加大会者的身分来说，代表性更广泛了。

大会是由名作家金丁当主席。金丁在致开会词时说：

“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当不胜悲痛，悲痛的不仅是失去了伟大的导师，而更大的却是民族苦难未过去而且日胜一日。但另一方面，今天纪念鲁迅先生又感莫大骄傲，鲁迅先生是民族的光荣，他的战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

金丁致词后，由吴昆华报告鲁迅的生平。接着由教育界人士薛永黍演说，他说，一个人的伟大需要时间和历史来判断，有些人躯壳一埋就完了，有些人死了，他的名字还是一年年发扬光大，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著名政论家胡愈之也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追忆十一年前上海人民为鲁迅的死，举行数万人行列的“中国第一次人民的葬仪”。（胡愈之一九三六年在上海，他是“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委员”）

在大会上讲话的还有张昆、职工总会代表谢仪与妇联代表伍亚雪、戏剧界人士杨嘉等人。

大会议决，致电中国文艺家协会及港澳分会，表示慰问与勉励。

当天晚上，星华文艺协会在大世界大西洋戏院主办纪念鲁迅文艺晚会，到场的人比日间的纪念会更多，气氛更热烈。

在节目表演之前，由吴昆华致词。

当晚表演的节目有：一、民主建国大合唱（歌咏·铜锣合唱团）；二、印尼舞（儿童剧团）；三、海燕（散文诗朗诵）；由中国旅行艺术团——即“中艺”的童哲朗诵）；四、俄罗斯情歌（“文协”米军演唱。米军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六、你这个坏东西（朗诵。由“文协”罗棠负责）；七、二胡（清奏。中国歌舞剧艺社）；八、野孩子（话剧）；九、渔光曲（歌舞。中国歌舞剧艺社）；十、故乡（“中艺”左岫独唱）；十一、休息；十二、方言歌咏（民众联谊会歌剧队及民声歌剧社）；十三、人民唱（客家山歌。杜雄光演唱）；十四、阿Q正传（剪影朗诵。海鸥剧团）。

十月二十一日晚上，又在同样地点多演一场。

从上述节目的内容及参加演出的单位阵容看来，这样的纪念晚会是空前盛大的。如果说有美中不足的话，那么，我想有两点应该提出来：一是缺乏与鲁迅有直接关系的节目；二是过于侧重反映中国社会的节目，缺乏反映本地问题的节目。

張天白論魯迅

在三十年代的馬華文藝界，對魯迅的精神認識很深，推崇備至，並且以實際行動捍衛魯迅精神，宣傳魯迅的思想與文藝主張的馬華文藝工作者，是有好幾位的。張天白是這些文藝工作者當中相當特出的一位。我們要研究魯迅對馬華文藝界的影響，尤其是要了解魯迅的思想對三十年代馬華文藝界的影響，是不能不重視這位早期的魯迅研究者的。

張天白論魯迅的文章，就筆者所知，多半發表在三十年代下半期的《星洲日報》與《檳城新報》。其中有專論，也有在談論別的問題時提及魯迅的。這些論魯迅的文章，就當時的水平而言，是相當高的。尤其是在一九三六年上半年，中國文藝界有“兩個口號”之爭，有些人受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這“四條漢子”的影響，對魯迅有所誤解，甚至追隨“四條漢子”，非議魯迅“不善于團結友伴”，“不了解文藝統一戰線”等等。也有的人採取折中主義的態度，認為“錯誤人人有份，各打五十大板”，他們覺得“國防文學”有好也有壞，魯迅所提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也是有好有壞，兩者可以“取長補短”“平分秋色”。在當時（一九三六年），張天白

的一些文章，虽然没有明确地否定“国防文学”，但是，对于周扬、徐懋庸一伙围攻鲁迅，大搞宗派活动的劣行，张天白表示了极大的反感与愤慨，并且撰文予以痛斥。

笔者在查阅旧报纸时，就看到张天白两篇捍卫鲁迅，批判周扬的文章，一篇是《文坛十讲》，刊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至七月初的《星洲日报·晨星》。另一篇是《读徐懋庸〈还答鲁迅先生〉》，刊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七日《星洲日报·晨星》。前一篇文章颇长，在报上连载多日。署名“太阳”，根据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这是张天白当时常用的一个笔名。在这篇长文中，张天白对于当时中国一些作者非议鲁迅，攻击鲁迅的言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一一予以批驳。另一篇文章则集中火力批判周扬与徐懋庸。这篇文章署名“马达”，据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那也是张天白当时常用的笔名。这篇批判周徐的文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文字泼辣，篇幅不大，却说清楚了好几个重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指责徐懋庸的个人主义作风，强调他才是搞“意气之争”，并暴露徐懋庸立意挑拨鲁迅与巴金、黄源的关系的阴谋。

第二、强调徐懋庸与周扬、田汉是一伙人，他们对鲁迅的毒恶攻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是蓄谋已久的。这一点，跟周扬一伙在二十多年后搞的一条颠倒历史和是非的注释截然不同。当周扬等人把持文艺出版大权时，曾经借出版鲁迅著作的机会，塞入一条颠倒历史与是非的注释，说当年鲁迅与徐懋庸的争论是个别的事件，徐懋庸写信攻击鲁迅是徐的个人行动，与

周扬等人“无尤”。张天白写道：“徐懋庸虽然好象不甘和田汉周起应（即周扬——笔者）们同流合污……徐懋庸和周起应（文学界编者）的文字姻缘，以及和社会日报的关系（徐懋庸自供）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徐懋庸纵不至于堕落到和田周（即田汉与周扬——笔者）一样，也不能洗刷嫌疑的。”在张天白笔下，田汉与周扬是文艺界的败类与蛀虫，当时马华文艺界有些人对田汉周扬的认识还很肤浅，有些人只看到田汉在戏剧上的一点成就，就一直觉得他很不错，有些人则因为周扬拉大旗做虎皮，手中又挥舞指挥棒，以为他是代表中国前进力量领导文艺工作的“权威人士”。而张天白能认真学习鲁迅，紧跟鲁迅，对周扬、田汉很不恭敬，毫不留情地批判与揭露他们的蛀虫行径，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三、指出徐懋庸鼓吹“国防文学”的活动是包含浓厚的宗派色彩的。张天白这样写道：“徐懋庸对于口号的执拗是宗派的，对准进步作家的精锐放枪，是‘格杀民族的革命力量’。”

在同一个时期，一些有进步倾向的马华文艺作者，尽管对鲁迅是相当尊重与敬佩的，但是，对于“两个口号”之争的重大意义却估计不足。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三日《星洲日报·文艺周刊》发表的署名之角的文章（题为《“作家”拾感》）有一则是专谈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的。作者希望“两个口号”的论争能平息，因为他认为这是自己营垒内的不同意见，争下去会妨碍团结。作者说：“自夥里的论争总是不幸多而幸少”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关路线，不能不争。把鲁迅与“四条汉子”的这场大论战看成是“不幸事件”或渗杂了“私怨”，这

就搞错了问题的实质。作者承认鲁迅答徐懋庸的公开信（全题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论到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上段”，“非常之值得我们精细的注意。”但是，作者却说对鲁迅文章的后一部份，“勿宁少加注意吧”。为什么要少些注意呢？翻开鲁迅答徐懋庸的那封公开信的后一部份来看，原来鲁迅对周扬一伙的阶级本质及藉先进之名以谋私利的行径做了非常深刻和无情的揭露。鲁迅愤怒地说：“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大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对于某些在进步阵营里没有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与作风的作家——特别是周扬一伙，鲁迅作了十分深刻的分析：“在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噉噉嚙嚙，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象这样的精辟分析，是应该仔细阅读的，怎能不加注意呢？在这方面，张天白就比之角等马华文艺作者高明些，看得透彻些，他无保留地，坚决地支持鲁迅对徐懋庸、周扬一伙的严厉批判。

鲁迅逝世后，张天白还写了一些纪念文章（见本文的附录）。其中一篇写于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天，题为《集体主义旗下的鲁迅先生》，是一篇分析鲁迅思想及痛斥周扬一伙围攻鲁迅的罪行的重要文章。在颂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同时，张天白还清楚地指出了一批曾经“进步”过的作家的蜕化变质和叛变。张天白这样写道：“从新青年时代起，曾经同走过一段

(路)的有不少已烟消云散，或已成为敌人，但他(指鲁迅)一个人却始终跟着时代向前。我们在此举些例子：这些走过一段路的战友，有的拜佛念经了，有的在利禄薰心之下被诱惑了，有的表面还是好人，实质已是不堪闻问的，戴××，向培良，韩侍衍，田汉，杨邨人，穆木天，丁玲，曹聚仁，周扬，不都是这一类的证明吗？”

张天白在一九三九年的《星洲日报》新年特刊上发表一篇总结性的长文《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署名丘康)，其中有一节是《纪念中国文学之父》(严格地说，这个称号是不通的，不恰当的)。在这段文字中，张天白指出在鲁迅逝世后，仍有人因为受了周扬等人的影响，对鲁迅的认识有不足或错误之处。他也记述了马华文化界两年多来的纪念鲁迅的活动，这对于我们了解鲁迅对马华新文艺的影响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张天白的这段文字是：

“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坛之父，所有进步阶层的代表者，对于鲁迅先生是极推崇的。然而在马华却正有人追随已成陈迹的宗派主义，重复着过去的纠纷。第一，有人说鲁迅先生是转变过的。但他的历史证明，从“五四”运动起，鲁迅先生一切的斗争，都和当时的新文化运动打成一片，所谓转变真不知何所依据；第二，有人说鲁迅先生的作法，已不适用于现在。这是忘记了他自身所处的境地是什么。鲁迅先生的作品，决不是天外飞来的吧！

“鲁迅先生逝世，已经两年多了，在中国，目前正开展的局面，是鲁迅先生的预示，这种预示，取得了千千万万的崇拜

者，他已经不只是文艺界的领导者，实际可说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了。马华文艺界从他逝世之日起，纪念的方式，出特辑，开会纪念。象中国鲁迅先生学院，及编辑鲁迅全集之类的，则有筹备已久的树人图书馆，据说这筹备手续行将告终，不久即可开幕了。然而这限于一地。本年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便有多起集款汇寄鲁迅学院，因为这学院不特纪念了鲁迅先生，同时，更和民族解放运动相连系。

“鲁迅先生的精神，活着，永远活在马华文艺工作者的心里。”（原载一九三九年《星洲日报》新年特刊，转录自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第505—506页）

关于张天白的生平事迹，这里有必要约略介绍一下（参阅方修著《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

张天白原籍广东省梅县，一九三〇年南来。历任《槟城新报》编辑、吉隆中国学校与加影华侨中学教师。一九四八年前后回中国。

张天白南来后不久，就开始他的文学活动，经常向《星洲日报》的《繁星》及《槟城新报》的副刊投稿。一九三二年以后，写得更勤，而且常以杂文，评论文学、艺术、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范围很广，对社会问题有相当广泛的知识。在当时，他的杂文的思想水平也相当高，常以先进理论为指导，分析社会问题，在思想上与写作上，受鲁迅的影响很深。他对鲁迅也一直是推崇备至的。方修先生认为他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一九三六——一九四二）的重要作者之一。“但或因年龄的关系，对于若干人事上比较

复杂的问题，不敢坦率直言，因而也有些读者嫌他过于老成持重。”

张氏所使用的笔名有太阳、马达、丘康、丘幸之等。

一九七七年八月作



集體主義旗下的魯迅先生

(馬達 (張天白))

魯迅先生的死訊，從電報中傳來，只要能認識魯迅先生畢生在中國文壇的盡責，誰也不能不為他悲痛。是的，中國文壇在今日，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白天里講此官（冠）冕堂皇的話，暗夜里進行一些離間分裂的勾當的”，的確也是多多。然因魯迅先生的明察秋毫，他那光明燦爛的夜燈，是能夠引導青年走上正確道路的。現在，這種情形還沒過去，也許以後還要加甚起來，但是，已經沒有了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正確的指示了。中國文壇受到怎樣不可言狀的損失啊。

然而，不必悲傷，魯迅先生已經去世了，此後，繼魯迅先生而從事文藝運動的人們，應該怎樣加倍努力起來，踏着 he 生前所領導的大路，對準目標不顧一切的向前跑？

✻

魯迅先生不久以前還在大病中，但在苦疾時期，他還是和平時一樣關心中國文藝運動的。在周揚輩假借“國防文學”題目，進行他們不可告人的恥辱時，對救亡情報的記者答覆文壇動向是如何的懇切。他說：“我始終認為在民族解放鬥爭這條聯合戰線上，對於那些狹義的不正確的國民主義者，尤其是翻

来覆去的投机主义者，却望他们能够改正他们的意思。”真的，象周扬们所解释的国防文学，还成什么新文学运动呢？不明显的口号，该有别的口号补足，是谁也不能否认吧！因而，在鲁迅先生指导之下，民族××××（革命战争——刊出者打叉）的大众文学，从胡风的笔底出现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处置，只要不把新文学做牺牲品，这种提示，是新文学运动的救生圈。

然而，徐懋庸为着关在国防文学的禁宫里，居然作出等于出卖灵魂的事体来。他前次所写的论文，关于口号问题的，和周扬站在同一的立场，这样，纵使徐懋庸出于无心，事实上已经是周扬的忠实同志了。鲁迅先生不客气的指正，在他《答徐懋庸并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一文里，说得如何透彻、明了，郭沫若辈却以“格杀勿论”相讥哄，这是糊涂的（得）可以的。

此外，他在病中的关心，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站在正确的现实主义的立场，给以简明的指示，《答脱洛斯基派信》，站在联合路线的立场，把破坏联合的人们教训一顿，并且编成《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介绍较完全的珂勒惠支的艺术。在病愈之后，《……也是生活》里，更把周扬辈鼓吹赛金花式的救国讽刺了。你看，鲁迅先生的关心文坛，怎样使人敬佩呢？



鲁迅先生是嫉恶如仇的。以正人君子的陈源，摇头叹息的叶渊，古书的蛀虫顾颉刚，至新月社梁实秋，解放词人曾今可，庄子文选施蛰存，以及扼死《译文》的傅东华，“指导家”徐懋庸，只要不正确，便不客气据理指斥，这里没有交际家的方

圆，也没有阴谋家的虚伪，切实诚恳的态度，是要使人激动的。

他对于思想上的批评歪曲，一样很尽力。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把夸耀“黄人之血”的作者纠正了。在《华德保粹优劣论》及《华德焚香异同论》（“香”应是“书”之误，见《准风月谈》——录者）把法西斯蒂讽刺了。在《论第三种人》把苏汶之流的超然风度指正了，在《答脱洛斯基派信》，更把左倾幼稚病克服了。

杨邨人的“资产阶级旗帜”，曾今可的“国事管他娘”，施蛰存劝青年“读庄子文选”，张资平的“恋爱至上主义”，赵景深的“顺译”问题，以及国防文学的关门主义，都一样，他精彩的言谈，真如“片言决狱”的果断有力。

※

然而鲁迅先生并不是人身攻击。他是“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主张者。自然，鲁迅先生的杂文里，随处都可以发现嫉恶如仇的情形，但这些的“恶”，是应该给以纠正的。所以，鲁迅先生常说他的话，过就丢好了，只要使之纠正，并不存心攻击的。这种态度是对的。

他笃念旧友，尤其爱护青年。然而在他笔下所表现的，并不是包含一切旧友，也不是包含一切青年，比如李守常（即李大钊——录者），九一八的殉难者，一九三一年失踪的一群（指被杀害的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录者），在他的字里行间所表示的同情与痛切，“如丧考妣”的血泪（这里显然用词不当，“如丧考妣”含贬义，显然不合作者原意——录者），悲愤，都是十分明显的。

但他不只是限于战斗的青年，刘复鄙视一般青年的打油诗，不是曾经鲁迅先生暗射过吗？自然，徐懋庸式的青年不在内的。



在此我们应该想到鲁迅先生的纯洁，奋斗。

他从北京政府服务时代到现代，飞黄腾达的朋友与学生，不说不多，然而他从来没有过做官的倾向。在答徐懋庸信里，田汉周扬同时出现的时候，各人特别的约谈是可想的。然而他不动心，还把这事实发表出来，这是如何表示他的不甘污染了。

从新青年时代起，曾经同走过一段的有不少已烟消云散，或已成为敌人，但他一个人却始终跟着时代向前。我们在此举些例子：这些走过一段路（的）战友，有的拜佛念经了，有的在利禄薰心之下被诱惑了，有的表面还是好人，实质已是不堪闻问的，戴××，向培良，韩侍衍，田汉，杨邨人，穆木天，丁玲，曹聚仁，周扬，不都是这一类的证明吗？



鲁迅先生站在正义人道及文化动向所表示的不屈不挠，他坚忍耐苦，是被人公认的。

在广州，他不怕那可怕的学者，给以“候审”的威吓，在上海他不怕那可怕的警告，这是小小的证明。

在《死》的杂文里，他表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不是狭隘。这是站在正确立场说话的。

他从一九三〇年发起自由运动大同盟，随后成立“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到最近发起“文艺工作者宣言”，把个人献身
在集体主义之下了。

他奋斗的路程还没走完，却居然离开他奋斗的世界去了。
世界人类应该怎样表示悲痛啊！

一九三六，一〇，廿一，

鲁迅先生逝世后第三天

刊于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周
刊·鲁迅纪念专号》



偉大的認識

魯迅先生逝世周年紀念作

丘康（張天白）

十月十九日，是我們中國文藝界現實主義的導演魯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日。我們應該怎樣認識魯迅先生的偉大，繼續着他所引導的道路向前走呢？

中國被稱自稱的文藝家，不能說是不多了，然而，魯迅先生却特別不同地受人民大眾歡迎，在他逝世之日，不但進步的智識份子，洒着悲痛的眼淚，就是勞動階級，也并不異樣地表示哀感，這是不無原因的，郭沫若先生說，為什麼中國青年不擁護我郭沫若，而獨擁護魯迅？魯迅先生的偉大，就在這裡。

魯迅先生雖然在新青年（指《新青年雜誌》——錄者）時代，一開始便正視現實，同情現實主義的一切，但那時，只以個人出場，並沒有真實地和先進階級發生組織上的聯繫。魯迅先生直接得到先進階級的領導，是在革命失敗之後，一九三〇年新興文藝組合的成立而開始的。這是魯迅先生給中國廣大的智識份子和勞動大眾以更深切更普遍的認識，誰都知道並不是偶然的。

中國在『九一八』之後，先進階級以暫進的姿態，一天天擴大發展地領導着民族革命的向前，一九三六年一月止，先進階級完全以民

阶级完全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推动当前的运动，中国文艺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这么出现的。在当时，中国文艺界的确免不了乱杂，有的主张效法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有的主张一个口号而排斥了其它口号，其实，这都不是先进阶级的本意，而是关门主义闭门造车的事实。

鲁迅先生在这时期，特别指明中国的统一战线应该比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广泛些，而且也「无需在作品的后面有意地插一条民族革命战争的尾巴，翘起来当作旗子，」另外的一派——脱洛斯基的辈徒，一味提出高不可攀的口号，希望由此破坏现实的需要，而尽他对主子——日德帝国主义的分配的责任；但是，这样一来，就受到鲁迅先生的教训了，鲁迅先生在先进阶级正确的决策之下，对于推进民族统一运动的劳绩，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先进阶级在「抗日第一」的指示中，得到了中国广大人民大众的热烈拥护，就是世界各国，也改变它们向日的态度，而放心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推进。只有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才破坏这正确的提示，然而，在当时，却（）然有它们相当的势力，什么『先安内后攘外』什么『中日经济合作』，什么『忍辱负重』，凡是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与行动，都出之公然。这是鲁迅先生不忍看也不忍听的，从「伪自由书」到「花边文学」，一个长时期的著作，如其说是攻击当局，还不如说是鼓吹抗战来得恰切。因为鲁迅先生的批评当局，实际是为着抗日行动的完全取消，不免使人怀疑。我想，假如鲁迅先生能活到现在，他的拥护政府抗战的热心，

一定符合先进阶级所希望的。

作为抗敌政策决定的基础之一——恢复联俄政策，也是鲁迅先生特别提重的。在他「视中俄文字之交」一文里说，「……中俄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这虽然是说明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关系，无疑地他是站在「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立场而发言的。现在，中俄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就是鲁迅先生期望的第一步，我们伟大的导师，他的主张的胜利，就是先进阶级的胜利，那是不能分割的。

鲁迅先生从新青年「狂人日记」起，到他的绝笔——「章太炎的二三事」（正确的题目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逝世前两天写一录者）止，直接间接的文艺运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然而，他从来就没有忽视现实，他在艺术上的成功，对先进阶级任务说，是尽责最多，力量最大的。

「五四」运动时期，鲁迅先生是被称为「思想界的先驱」，一九三〇年后，却是先进阶级忠实的追随者，在抗日胜利的必然中，鲁迅先生的灵魂，就是整个中国民族的灵魂。

鲁迅先生精神不死！

中国民族独立万岁！

刊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洲日报》之《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

600427



鲁迅与马华新文艺

出版：风华出版社

地址：20A, Seah Street, Singapore 7

日期：1977年10月

定价：星币一元正

00B2

47 13/6